

乌克兰危机：欧洲的新分裂？

[德] 米歇尔·施塔克

内容提要：乌克兰冲突的深层根本原因是安全和一体化的双重困境，这种困境基于双方不同的观念感知。对于大多数西方国家来说，北约和欧盟的扩大是稳定和发展周边国家的战略。而在俄罗斯看来，北约的扩大是对自己的一种包围。俄罗斯目前的行为基本属于“防御”性质，而目前欧盟处理危机的方式显然缺乏远见。为了找到冲突的解决方式，双方需要更好地理解彼此对对方的观念，创造共赢的解决方式来克服零和博弈思维。

关键词：乌克兰危机 欧洲分裂 一体化困境 战略性防御 共赢思维

当前，国际上关于新的欧洲分裂问题被炒得很热。这种情况是怎么发生的？这种发展趋势的潜在根本原因是什么？可以采取什么步骤来缓和紧张局势并改进西欧与俄罗斯联邦之间的紧张关系？笔者认为，欧洲大陆的新分裂不仅是一个问题，而且是一种事实。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及至少是间接地对乌克兰主权进行军事干预的行为违反了国际法的主要准则和1989年之后的欧洲和平秩序。作为回应，西方国家对俄罗斯采取了政治和经济制裁。另外，北约官方宣布俄罗斯对欧洲安全构成威胁，并且暂停了同俄罗斯自1997年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因此真正的问题是：这种新的分裂是否会演变为长期的结构性的变化？或是还有可能在俄罗斯、北约和欧盟之间再次达成某种形式的合作？笔者在本文中的观点是，乌克兰冲突的深层根本原因是安全

乌克兰冲突的深层根本原因是安全和一体化的双重困境，这种困境基于双方不同的观念感知。

[德] 米歇尔·施塔克 (Dr. Michael Staack) 博士目前是德国汉堡联邦国防军大学（也称“赫尔穆特·施密特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教授。作者感谢戴维·格罗滕 (David Groten) 的帮助。

和一体化的双重困境，这种困境基于双方不同的观念感知。对于大多数西方国家来说，北约和欧盟的扩大曾经是，并将继续是稳定和发展这些加入西方社会的国家的战略。而在俄罗斯看来，北约的扩大是对自己的一种包围。为了找到目前仍然在延续的冲突的解决方式，双方需要更好地理解彼此对对方的观念，创造共赢的解决方式来克服零和博弈思维。

为了理解目前在乌克兰及其周边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有必要追溯其根源，并理解其中“战略层面的原因是冷战后欧洲和欧洲—大西洋制度建设所宣称的，创造一个全面、自由和和平的欧洲的失败”。¹ 20世纪90年代初，在东西方冲突结束的最初几年里，曾经有在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CSCE）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泛欧洲安全秩序的真正机会。尤其是，当时的德国外长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和其他东西欧领导人赞同这种政治发展。但这个机会之窗因为三个原因而关闭了：

1. 苏联和华沙条约组织解体；
2. 大多数中东欧国家宣布希望加入北约；
3. 基于上述两个事实，美国、德国和北约决定改变他们的政策，邀请新成员加入西方联盟。²

在促成德国统一的2+4谈判进程中也进行了有关北约扩大的讨论。具体而言：从未有具有约束力的法律协议或条款宣布北约在未来不能扩大。然而，德国、苏联和美国领导人当时的政治立场是：这种扩大是不应发生的。³ 另外，那时的政治环境同几年之后相比有所不同，因为当时乌克兰和格鲁吉亚还是苏联的一部分。在1991年中访问基辅时，美国总统老布什公开宣称，他乐意见到乌克兰成为进行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苏联的一部分，而不是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很明显，对于当时的德国领导人（如总理科尔）来说，始于1994年的北约扩大只有在同俄罗斯保持一致，或至少没有其反对的情况下才能进行。⁴ 在几次高层会面中，科尔都把扩大北约称为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方面是中欧和东欧国家的成员国资格，另一方面是政治上非常重要的，同俄罗斯的强有力且稳定、制度化的伙伴关系。1997年签署的具有法律效力的《俄罗斯—北约相互关系、合作与

1 Samuel Charap, “The Ukraine Impasse,” *Survival*, Issue 5, 2014, p. 229.

2 Mary Elise Sarotte, 1989: *The Struggle to Create Post-Cold War Europe*, Princeton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Michael Staack, “NATO-Erweiterung und gesamteuropäische Sicherheit – Ein Zielkonflikt für Deutschlands Außenpolitik? (NATO Enlargement and Pan-European Security – A Priority Conflict for Germany’s Foreign Policy?)”, *Die Friedens-Warte*, Issue 3, 1997, pp. 273-286.

3 John J. Mearsheimer, “Why the Ukraine Crisis Is the West’s Fault. The Liberal Delusion That Provoked Putin,”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14, p. 78.

4 Wolfgang Ischinger, “Baumängel am ‘gemeinsamen Haus’ (Construction deficits of the ‘Common House’)”, *Internationale Politik*, Issue 3, 2014, pp. 19-21; Helmut Kohl, *Aus Sorge um Europa. Ein Appell (In Concern about Europe. An Appeal)* (Droemer-Knaur Verlag) 2014, p. 103 ff.

安全基础法案》，也是这种双轨战略的产物。¹ 在这个文件的条款中，北约保证不会在新的北约成员国领土上“永久性地”部署任何具有“实质性”数量的军队。

但在仅仅两年之后的1999年，科索沃危机的发生和北约在没有任何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进行的军事干预严重地损害了北约和俄罗斯的关系。² 美国和北约决定采取单边行动，俄罗斯的情况不仅未被考虑其中，反而被视为是采取必要紧急行动的一个障碍。在进行军事干预之后，西方国家寻求俄罗斯的支持来完成谈判，并邀请俄罗斯加入维和行动。然而，这些缓和俄罗斯胸中怒气的努力未能成功。在俄罗斯看来，科索沃问题一举成为同西方和北约关系中的负面标志性事件。因此，自1999年以来，俄罗斯将同西方联盟所谓的“战略伙伴关系”解释为没有实质意义的建设行动，“对俄罗斯的‘政治心理’和‘帝国幻觉的痛苦（imperial phantom pain）’几乎没有给予什么理解，而且在冷战结束之后，也没有对俄罗斯在欧洲安全秩序中的地位给予应有的关注”。³ 大多数西方国家不接受俄罗斯作为同等地位的伙伴，更糟糕的是，考虑到俄罗斯在军事方面的优势，西方既没有遵守国际法，也没有尊重国际制度和俄罗斯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重要地位。⁴ 对大多数俄罗斯的精英来说，北约和俄罗斯的伙伴关系已经不复存在了。

又过了两年，自2001年开始，小布什政府转移了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以往的老布什和克林顿政府并未将俄罗斯视为潜在的敌人，而仅仅将它看作是一个难以对付的伙伴。总的来说，这两位总统都努力维持同俄罗斯的良好关系。他们的努力得到了主要的欧洲大国，尤其是德国和法国相应政策的补充。小布什政府对同其他主要大国展开真正的合作并不感兴趣，对他和他的政府班子来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出的，和俄罗斯建立更强大更好的合作关系没有任何价值，并且也不在他们的战略议程重点中。相反，小布什政府认为俄罗斯是一个潜在的竞争者或者是对手。在小布什政府的世界观中，必须要遏制所有的竞争者，如俄罗斯、中国和欧盟，以便维护美国首屈一指的优势地位。⁵ 在一些特别的情况下，他甚至采取了“推回政策（roll-back policies）”。2001年前，为了照顾俄罗斯的核心利益，除了波罗的海国家，北约的扩大严格限于原苏联领土范围之外的国家。但小

1 Founding Act on Mutual Relations,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Between NATO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Signed in Paris, France, May 27, 1997, http://www.nato.int/cps/tr/natohq/official_texts_25468.htm, 2015-04-10.

2 Vincent Pouliot, *The Politics of NATO-Russia Diplom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94.

3 Klaus Wittmann, “The West is Not Russia’s Enemy,” *The Atlantic Times*, September/October 2014, p. 5.

4 Regina Heller, “Subjectivity Matters. Reconsidering Russia’s Relations with the West,” in Roger E. Kanet and Maria R. Freire, eds., *Russia and European Security*, Dordrecht: Republic of Letters Publishing, 2012, pp. 45-78.

5 Ivo H. Daalder and James M. Lindsay, *America Unbound. The Bush Revolution in Foreign Polic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3.

布什没打算尊重俄罗斯的利益，或者说是主要欧洲盟友的顾虑，他的政府班子邀请原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如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格鲁吉亚、摩尔多瓦等国，以及最后但同样重要的乌克兰加入西方军事联盟。

早期的普京政府和前任的叶利钦政府一样，向西方提议展开各种形式的合作，结果只得到了漠视甚至恶化的对抗。在俄罗斯人看来，美国不再用双赢的框架来定义与俄罗斯的关系，而是出于地缘政治中零和博弈的考虑来行事。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俄罗斯总统普京试图加强与主要欧洲大国，如德国和法国的关系，而根本性的战略再定位，如转向远东、中国和上海合作组织（并形成一个颠覆性的联盟“renversement des alliances”）的举措并没有发生。俄罗斯把美国和北约视为对手，重整军事力量，加强了同金砖国家等新兴大国的关系，但同时仍然对同西方进行更紧密的合作持开放态度。在一个短暂的时期中，奥巴马总统对俄罗斯的“重启政策”（new start policy）缓和了双方的紧张关系，并敞开了有限的机会之窗来重塑更加稳定的关系。在俄罗斯看来，西方国家2011年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以及2011年以来对叙利亚（更为隐蔽）的干预再次关闭了这扇机会之窗。与此相反的是，西方大国认为俄罗斯及其在安理会的否决权是对国际问题寻求国际性解决方式的主要障碍。至少，从2011年年中开始，“重启政策”成为了过眼云烟。¹

北约（随后是欧盟）扩张，特别是科索沃战争之后的扩张，给俄罗斯制造了一个安全困境。

这就是目前冲突的核心所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北约（随后是欧盟）扩张，特别是科索沃战争之后的扩张，给俄罗斯制造了一个安全困境。根据约翰·赫茨（John Herz）² 和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³ 的定义，安全困境是指一种现象，在这种现象中，“一国获得的安全无意中威胁到了其他国家的安全”。⁴ 各国为了强化自身安全而采取的许多步骤往往在无意中使其他国家感到更加不安全。由于不同的经济和政治—安全一体化机制的竞争，便产生了安全困境的一种特别形式——一体化困境（integration dilemma）。当一国认为其周边国家加入军事联盟或经济集团的一体化行为威胁到了自身的安全和繁荣的时候，这种困境就出现了。⁵ 排他性是这一困境的来源。“被定义为正和博弈的一体化进程，因为排他性地吸收了一国的周边国家加入，从而使这一进程转化为零和博弈。和安全困境一样，邻国的意图

¹ Angela E. Stent, *The Limits of Partnership: U.S.-Russian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² John J. Herz, “Ideal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Issue 2, 1950, pp. 157-180; John J. Herz, *Political Realism and Political Idealism: A Study in Theories and Realitie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51.

³ 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Issue 2, 1978, pp. 167-214.

⁴ Ibid., p. 170.

⁵ Samuel Charp and Mikhail Trotskiy, “Russia, the West and the Integration Dilemma,” *Survival*, Issue 6, 2013/14, p. 50.

和一体化机制支持者的提议，在无需对已经产生安全疑问的国家怀有敌意的情况下，就可能导致一体化困境的出现。实际上，由于倾向于对其他国家的动机做出最坏的假设，一国的困境就会转变成国家间冲突的根源。在竞争双方缺乏或没有沟通（和建立互信）的背景下，这种假设会不断升级，形成代价高昂的螺旋式上升的行动—反馈循环。“在一体化困境中，竞争双方的领导人都会竭力劝诱和迫使一国加入他们各自的阵营，并不断各个击破，减少他们之间的信任，随着竞争的升级，其负面影响不断加剧”。¹ 这就是小布什政府努力推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加入北约带来的影响。这一进程随着2008年4月德国、法国和西班牙的反对而中止。对奥巴马政府来说，正如之前讨论到的，北约的扩大并非其上任初期的头等大事，他甚至赞成“重启”与俄罗斯的关系。实际上，自2014年初开始，对大多数西方决策者来说，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北约成员国地位问题只是一个不那么重要的议题。由于考虑到俄罗斯未来对乌克兰的政策，这种情况在未来几年可能出现变化。

欧盟扩大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令许多观察家吃惊的是，多年以来欧盟被俄罗斯视为战略竞争者或对手。² 更糟糕的是，“在俄罗斯领导人眼里，欧盟的扩大是在为北约扩大做掩护”。³ 这种观念直接源自欧盟2009年启动的所谓“东部伙伴关系计划（*Eastern Partnership*）”。⁴ 这项计划邀请原苏联地域内的六个国家：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乌克兰与欧盟开展紧密合作，目的是让这些国家在不加入欧盟的情况下同欧盟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然而，欧盟委员会准备的联系协定（《深入而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Deep and Comprehensive Free Trade Agreement）》）是非常具体的，参与国需要取得充分的国内进展以达到欧盟的标准。作为对“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回应，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一起发起了自己的组织“欧亚关税同盟（Eurasian Customs Union）”，亚美尼亚也加入了这一组织。到2015年，这项一体化将会升级，一个新的、肩负更多使命并更具综合性的“欧亚经济联盟（Eurasian Economic Union）”将会成立起来。俄罗斯的制度建设和政策的特点也许最应该被归结为“战略性防御”。从俄罗斯自身角度出发，很容易就可以判断出在“东部伙伴关系计划”中无利可图，因为这不仅不会给俄罗斯带来任何好处，反而推动欧洲所有

1 Samuel Charp and Mikhail Trotskiy, “Russia, the West and the Integration Dilemma,” *Survival*, Issue 6, 2013/14, pp. 50-51.

2 Kian Kottke, “Die EU und Russland. Barrieren auf dem Weg zu einer stabilen sicherheitspolitischen Partnerschaft (The EU and Russia. Impediments on the Way Towards a Stable Security Partnership)”, in Michael Staack ed, *Europa als sicherheitspolitischer Akteur (Europe as a Security Actor)*, Opladen: Budrich Publishers, 2014, pp. 103-123.

3 John J. Mearsheimer, “Why the Ukraine Crisis Is the West’s Fault. The Liberal Delusion That Provoked Putin,” p. 79.

4 Lawrence Freedman, “Ukraine and the Art of Crisis Management,” *Survival*, Issue 3, 2014, p. 17.

的原苏联加盟共和国都将与欧盟而不是俄罗斯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1994年，欧盟和俄罗斯签署了第一个合作协议，这个协议多年前就到期了，由于双方在一系列事务中的分歧和冲突，新协议还遥遥无期。

是否可以同时追求“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和“欧亚经济体”的成员国地位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虽然其中有许多困难有待处理，但这种解决方式似乎是可行的。¹ 然而，看起来很明显的是，欧盟在谈判中并未真正准备讨论这种情况，在乌克兰问题上尤其如此。相反，欧盟的主要官员，如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强烈反对寻求任何双重成员国地位的建议。不同的政治家，如在2009年前主管欧盟扩大事务的前欧盟委员会委员费尔霍伊根（Günter Verheugen）和主导了欧盟—乌克兰联系协定谈判的现任乌克兰外长帕夫洛·克里姆金（Pavlo Klimkin）都肯定了欧盟这种严肃的谈判战略。²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原苏联领土上的一体化，欧盟支持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的地区一体化。总的来说，人们可以明显看出欧盟最重要的目标是吸纳乌克兰和其他“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参加国进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但却不准备创造任何可以同最大的邻国俄罗斯取得双赢的解决方式。紧随在2011年以来“阿拉伯之春”中乏善可陈的表现之后，欧盟在三年中第二次采取了没有战略远见的行动，低估了俄罗斯的反对立场，结果不仅没能建立起与自己最重要的邻国俄罗斯的共识，而且没能意识到与俄罗斯持续保持密切沟通的重要性。³ 另外，在明知事态已经在2013年秋冬升级之后，乌克兰问题仍然没有成为德国的优先考虑事项，因为当时德国国内正在就组成新的联合政府进行谈判。而且，由于自己的党派没有能够再次被选入德国议会，时任德国外长基多·威斯特威勒（Guido Westerwelle）被看做是“跛脚鸭”和“临时看守者”。

接下来的故事尽人皆知。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决定不在欧盟联系协定上签字，乌克兰的抗议者不断增多，事态持续升级。欧盟法德波“三驾马车”谈判达成了一个协定，允许乌克兰提前进行总统选举，但基辅街头的抗议者并不接受这一结果，在一触即发的形势下，经选举上台的总统离开了祖国。在一场“四个可在法律上被称为‘新法西斯主义分子’的高层人士参与的政变之后，乌克兰产生了新领导层。⁴ 新政府忽视了该国东部俄罗斯人聚居区的利益，其结果就是俄罗斯非法吞并了克里米亚共和国，并支持乌克兰叛乱分子在该国东部挑起冲突。为此，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以期令其外交政策转向。然而，对俄罗斯来

¹ Lawrence Freedman, “Ukraine and the Art of Crisis Management,” *Survival*, Issue 3, 2014, p. 58.

² “Interview with Ukrainian Foreign Minister Pavlo Klimkin,” *Die Zeit*, July 17, 2014, p. 4; “Verheugen zur Russlandpolitik: Warum Helmut Schmidt irrt (Verheugen on Russia Policy: Why Helmut Schmidt is Wrong),” *Spiegel online*, May 19, 2014, <http://www.spiegel.de/politik/deutschland/ukraine-krise-helmut-schmidt-von-ex-eu-kommissar-verheugen-kritisiert-a970150.html>, 2015-02-10.

³ Neil MacFarlane/Anand Menon, “The EU and Ukraine”, *Survival*, Issue 3, 2014, pp. 95-101.

⁴ John J. Mearsheimer, “Why the Ukraine Crisis Is the West’s Fault. The Liberal Delusion That Provoked Putin,” p. 80.

说，至少在短期内，国家威望似乎比经济利益更为重要。

乌克兰危机从一场内部的分裂发展成为全面的国际危机，并成为1989年冷战结束后欧洲安全合作架构中最棘手的挑战。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如何避免事态继续升级？怎样找出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为了恰当地处理这些问题，有必要讨论一下有关各方的核心利益。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视乌克兰为有重要语言、文化和历史纽带的相邻大国和“姐妹国家（sister nation）”。另外，俄罗斯也把乌克兰视为自己地缘政治势力范围的一部分。因此，乌克兰任何进一步同欧盟和北约一体化的举动，都会被俄罗斯视为“关乎生死存亡”的、对自身安全与核心经济利益的威胁。¹ 在基辅的政治动乱之后，至少从自身角度出发，俄罗斯认为局势面临着失控的危险。因此，普京总统通过支持克里米亚分立和乌克兰东部的分裂主义势力，采取了一种搅局战略，以便确保俄罗斯能长久地利用这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黑海半岛，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改变主导基辅的力量对比。俄罗斯领导人清楚，接下来一段时期内乌克兰可能不会有亲俄政府。考虑到变化的形势可能给俄罗斯带来的危害，普京先发制人地争取了某种政治和领土方面的最优结果。这种结果并不证明俄罗斯行动的正当性，也不能为普京在俄罗斯民众中的高支持率背书。普京是力量大增的俄罗斯的设计师，但如果他容忍和接受了乌克兰的政治动乱，那么他的国内领导力就会丧失殆尽，这仍然是千真万确的。

此外，乌克兰危机期间各方的决策和事态的发展与俄罗斯“背离”西方的动向是相生相伴的。这就是说，事实证明，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在预期和具体目标上的共识极为有限。更糟糕的是，普京总统一次又一次无所顾忌地挫败反对派和公民社会组织实现他们设想的企图，从而扩大了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价值观分歧。在兼并克里米亚的讲话中，俄罗斯总统再次提及一长串相关的冲突：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2007年科索沃的独立、美国导弹防御体系在欧洲的部署（这个体系未纳入俄罗斯，反而瞄准了俄罗斯）、北约的扩大、2011年干预利比亚时对联合国授权的滥用，以及2013年对叙利亚进行单边干预的威胁。² 在这种背景下，乌克兰的动乱被解读为西方释放的某种烟雾弹。也许人们可以争辩说若没有乌克兰危机的升级，俄罗斯本不会针锋相对地进行反击。在任何情况下，它（俄罗斯）“对事情的反应……一直都是防御型，而不是攻击型的”。³ 尽管如此，在那个非常时刻，普京优先考虑的是大国的地缘政治战略和国家威望，代价则是俄罗斯与欧

然而，对俄罗斯来说，至少在短期内，国家威望似乎比经济利益更为重要。

1 Samuel Charap, “The Ukraine Impasse,” p. 230.

2 Kremlin, Address by Presid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18 March, 2014, <http://eng.kremlin.ru/news/6889,2015-02-10>.

3 John J. Mearsheimer, “Why the Ukraine Crisis Is the West’s Fault. The Liberal Delusion That Provoked Putin,” p. 85; “Russia’s Motives in Ukrai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trategic Studies*, Issue 19, 2014.

洲深厚且未受损害的经济联系。因此，客观而言，俄罗斯的行为不仅危害了自身依靠能源出口的经济根基，而且限制了自己外交政策选择以及可能的伙伴关系，并因此损害了自身的利益。

美国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原因，但肯定正在利用这一切来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乌克兰危机给美国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来削弱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并将自己置于欧洲危机管理者的位置，使北约和欧盟的平衡朝着有利于北约的方向变化。此外，美国和欧盟在乌克兰危机上的共同利益，至少暂时能够弥补斯诺登披露美国对其盟国实施的全球监控战略带来的深度不信任感。与其务实方式相一致的是，奥巴马政府希望在同被削弱的俄罗斯达成新的谅解方面保持开放性的

欧盟支持一个主权完整、政治独立的乌克兰，同时也希望保持欧洲的安全合作秩序，并防止任何欧洲大陆的新分裂。

的选择。而与之相反的是，欧盟在乌克兰危机上的目标却是多重的。欧盟支持一个主权完整、政治独立的乌克兰，同时也希望保持欧洲的安全合作秩序，并防止任何欧洲大陆的新分裂。同样的，在危机升级之后，欧盟渴望被看成用一个声音说话的统一行为体。于是，欧盟试图对自己的双重反应给予额外的重视，这种反应把提供对话机会、实施制裁（和威胁）以及同美国保持一致的立场结合起来。其中，德国民众

和德国政府开始承担主要角色，寻求同法国和波兰保持密切合作。除了使欧盟成员国在最核心的目标上保持一般共识之外，各国在次要事务上的利益是不同的。由于中东欧成员国一般都支持对俄罗斯的“强硬立场”，德国、法国和其他西欧成员国试图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阻止俄罗斯追求自身的干预政策。这种政策的目标是建立同相邻大国的新的合作模式。¹

自从东西方冲突结束以来，重新统一后的德国在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范围内同俄罗斯联邦展开接触。相应地，在过去23年中，德国不断支持俄罗斯进一步参与到西方体制（如欧盟、北约、七国集团和八国集团等）的一体化进程中。在乌克兰危机发生前，德国是西方世界中对俄罗斯合法利益的最重要支持者。² 同时，俄罗斯领导人也一直把德国联邦政府视为除了美国之外最重要的西方伙伴，有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后者。逐渐增加的经济相互依赖，对俄罗斯 / 苏联支持德国重新统一的感激，以及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两国人民的和解是双方良好关系的核心要素。尽管两国的意见分歧在普京的第二个总统任期中增多了，但这并不影响上述结论。由此可见，欧洲的新分裂不会给德国带来任何利益：“在德国，遏制战略以及中断和俄罗斯的关系是行不通的，这不仅是因为这会背离德国长期以来在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不愿意用经济杠杆来实现政治目的的做法，也因

1 Stephen F. Szabo, “Germany’s Commercial Realism and the Russia Problem,” *Survival*, Issue 5, 2014, pp. 117-128.

2 Andreas Rinke, “Wie Putin Berlin Verlor (How Putin Lost Berlin),” *Internationale Politik*, Issue 3, 2014, pp. 33-45.

为俄罗斯是德国地理上的近邻，以及新东方政策留下的接触而非对抗的遗产。”¹

无论如何，对这个国际危机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还没有出现，恢复冲突各方的信任尚需大量时间和政治上的努力。不幸的是，“俄罗斯和西方国家领导人正让本国的公众准备好迎接对抗而非妥协”。² 因此，下面的三个提议也许可以推动当前亟需的对话进程：

(1) 乌克兰迫切需要实现经济和政治上的稳定，这是从根本上化解危机、寻求长期解决方案的主要前提条件。乌克兰政府和亲俄罗斯的分裂派在2014年9月5日同意停火，这为政治解决方案（包括东乌克兰实现高度自治或成立地方自治政府）铺平了道路。因此，目前在议事日程上应该把密切合作解决乌克兰困难的经济状态提到显著位置。由于乌克兰经济同时依赖于欧盟和俄罗斯这一事实，双方富有建设性的参与方式对成功的结果不可或缺。

(2) 乌克兰有权自由选择是否把自己和欧盟融为一体。目前这个欧洲的决定暂时得到了大多数民众的支持，但这并不意味着乌克兰的欧盟成员国地位，或是在可预见的将来乌克兰成为欧盟成员的前景，而只是意味着乌克兰把同欧盟的紧密合作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基石，而另一块基石是乌克兰未来的安全地位。在俄罗斯的干预下，支持成为北约成员国的民众增加了，但仍未达到大多数。以一个欧洲人的观点来看，乌克兰的北约成员国地位是否能够切实强化这一同盟是值得高度怀疑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同俄罗斯的紧张会加剧，并会妨碍其同俄罗斯形成任何伙伴关系。因此，走出困境的最好方式将是乌克兰采取不结盟的立场，而这一立场在乌克兰宪法中有规定，并受到欧盟和俄罗斯等主要大国的保障。³

(3) 有必要重启俄罗斯、欧盟和美国的关系。三方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评估当前的危机，重新定义他们的利益并为新的安排做准备。实际上，只有在紧密合作，而不是对抗或排斥俄罗斯的情况下，欧洲的安全才有可能实现。另外，任何安全安排都必须基于各方所接受的一般性准则。考虑到当前的国际议程，西方政界和俄罗斯之间的共同利益比任何意见分歧都更为重要。新的伙伴关系，至少在开始的时候会比20世纪90年代设计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加有限和务实，但这也将是更加可取且最为理性的选择。然而，更糟的情况也有可能出现。在任何情况下，对涉及其中的任何一方来说，对抗的代价都是极其高昂的。

(许钊颖 译；徐彤武 校)

1 Andreas Rinke, “Wie Putin Berlin Verlor (How Putin Lost Berlin),” *Internationale Politik*, Issue 3, 2014, pp. 124-125.

2 Samuel Charap, “The Ukraine Impasse,” p. 230.

3 Henry A. Kissinger, “How the Ukraine Crisis Ends”, *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6, 2014.